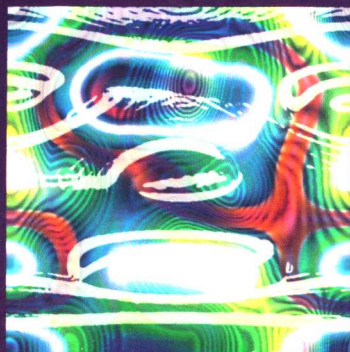


誰來做主

當代中國的企業決策



唐文方

誰來做主
當代中國的企業決策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6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誰來做主
當代中國的企業決策
唐文方著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 19 586582 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誰來做主？

當代中國的企業決策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吳 欽 科技與發展・中國發展專刊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使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誰來做主

當代中國的企業決策

唐文方

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已成為現代企業管理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本書以中國企業為研究個案，探討企業管理中的實踐與理論問題：工人參與管理的動機是甚麼；這種動機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中有甚麼區別；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後，對生產效率、經濟效益有甚麼影響；經濟改革與企業民主有甚麼關係；國家、企業和工人三者關係因此有些甚麼變化？

作者唐文方，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現為美國匹斯堡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社會與思想叢書

林青松 威廉·伯德編
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

王漢生 馬戎等編
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

目 錄

一 引言	1
二 國有企業的企業管理和鄉鎮企業的發展	11
三 企業參與的定義	29
四 企業參與的條件	43
五 企業參與與經濟效益	59
六 經濟改革與企業民主	73
七 結束語	95
附錄	103
參考文獻	123

一 引言

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已經越來越成為現代企業管理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很多學者認為，工人參與決策會推進企業的民主管理、增加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提高勞動積極性。企業內的民主參與還有助於培養公民在企業外參與國家政治的意識。由於認識到這些好處，不少國家先後建立起各種職工參與體系，諸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Self Management)、西班牙的蒙得拉根群體 (Mondragons)、以色列的集體農莊 (Kibbutz)、美國的雇員股份制 (Employees Stock Ownership Program)、德國的共同決定體制 (Codeterminations)，以及英國的合作社 (Cooperatives)。這些機構的建立雖然為工人參與企業決策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很少有人從職工參與決策的動機這一角度來考慮他們是否願意參與。他們也許並不關心是否有機會參與企業決策。如果已經有了一份工作，職工為甚麼要勞神去承擔本來屬於經理的額外責任？

本書的目的在於探討中國國有和鄉鎮企業中，工人參與管理的動機、這種動機在不同類型企業決策中的區別、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對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以及國家、企業和工人三者之間關係在市場經濟改革中的變化。

理論根據

現代民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公民自下而上參與各級政策的決策。公民參與的論點起源於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哲學家

誰來做主

盧梭的總體意志 (the General Will) 這一概念。對盧梭來說，總體意志是一個社會各種利益之總和 (Rousseau 1968, bk II, p.75)。它代表着一個社會的共同利益與情感。沒有這一共同利益和情感，文明社會就不會存在。正是在總體意志這一概念基礎上，國家得以建立自己的主權與權威 (Sovereignty)。盧梭最有影響的論點之一是主權的不可轉讓性。要想使表達主權的共同體意志具有代表性，這一意志就必須在共同體全體成員中產生。通過某些人代表老百姓決策的方法不利於個人自由和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發展。因此，公民必須直接行使立法權。只有當公民願意通過對話和討論而建立共同的立場，共同體才有可能「發現」總體意志。每個人都應當相信，共同體全體成員大會所做出的決定比每個人個人的決定都會更好、更具有代表性。在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時，公民尋求的不是妥協，而是共識 (consensus)。只有這樣，總體意志才能產出。(Sibley 1970, p.397)

卡羅爾·帕特曼 (Carole Pateman) 是盧梭關於直接參與思想的當代繼承人。她認為，在盧梭的理論中，公民參與決策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在參與過程中，個人「不得不」根據他的正義感、也就是盧梭所謂的「集體利益」 (constant will) 去考慮問題。因為其他公民總是能夠抵制出於私利的不公正要求。作為參與決策的一個結果，「……個人最終將感到在公共與個人利益之間只有很少乃至沒有衝突存在。」而且，在企業與團體內的參與將對國家政治的參與具有溢出效應。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個人認識到甚麼是民主。對帕特曼來說，參與是一個自我維持的、穩定的體系 (self-sustaining)。在這一體系中，每個人都需要自覺地參與。其結果不僅是政策的制定，而且包括每個人的社會與政治能力的發展。這對進一步參與起到一種良性的反饋作用 (Pateman 1970, 25, 31, 43)。

其次，學術界對政治參與的研究還受到了現代化學派的影響。

根據這一學派的觀點，政治發展與民主化的最顯著的一個標誌就是自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參與的增加，無論這種參與是在企業內、在某個組織中、在地方社區中，還是在國家政治水平上。民主參與和政治發展不會通過對上層建築和政治體制的設計而產生。只有在相對較高水平的工業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下，民主參與才能擴大。工業化使得專業化程度提高，社會分工更細，社會利益更加多樣化，企業的規模與複雜性增加，工人掌握了更多的專門性知識，使他們無論是個人還是做為一個整體都在與廠方的關係中獲得了更多的主動性。由於他們掌握了專門性的知識，在生產過程中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權，資方無法獨斷專行 (Crozier 1961; Hough 1977)。社會經濟發展帶給人們更高的生活標準、更多的經濟收入與閑暇時間，為政治參與提供了物質基礎。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水平也會得到改善。教育能夠增加人們對自己政治能力的信心，從而增強了人們參與的慾望。教育還能拓展人們的視野，使人們理解到寬容的必要，約束他們不去追隨極端主義信條，並增加他們在選舉中作出理智抉擇的能力 (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 Dahl 1971 and 1985; Lipset 1981; Almond and Verba 1980; Verba, Nie and Kim 1987)。因此，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是民主參與的先決條件。從世界範圍來看，所有先進工業化國家都有民主政體。

第三種對企業參與感興趣的是經濟學家，特別是一些比較激進的勞動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企業參與不僅是促進社會民主的機制，也是改善工人生產能力的有效手段，按照 Bowles (1988, 354) 的說法，逃避義務與怠工並不是人的本性，而是資本主義企業中的階級結構下的一種疏離。

工人參與企業管理能夠減弱逃避和疏離感，增大勞動付出和生產效率。還能增加工人的自尊感、自我成就感和與工作組織的認同感。努力工作不再是強制的，而是一種自覺自願的行動。瓦內克

誰來做主

(Vanek)認為企業參與和自我管理可以增加勞動付出高達800%。工人也將有強烈願望去發明創造。參與將為工人在工作中的創新在短期內得到採納開闢通道 (Vanek 1971, 31, 37-8)。埃斯皮諾薩和齊默巴裡斯特 (Espinosa and Zimbalist) 發現不僅參與增加了生產率，而生產率的增加又導致工人對參與的更大信心與更大滿足，而這又反過來激勵了工人要求更多參與的慾望。企業參與的效果在普通工人這一層次上最明顯。工人在生產車間中決策時積極性最高。像瓦內克一樣，這兩位學者也得出結論，認為國家生產能力的巨大增加可以歸因於工人參與所帶來的動力 (Edwards 1979, 163 and 174)。

雖然上述理論正確地強調了政治參與的重要性，但最令人困惑的問題是為甚麼人們不參與。在一些民主與非民主國家中，參加選舉的人數遠非令人滿意。對企業的研究表明工人很少有興趣參與管理決策，集體利益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有吸引力。即使有吸引力，應當靠誰作決定，是靠全體投票，還是靠某些代表？參與體系真的是能自我維持並在本質上穩定嗎？企業參與的適用性與形式必須予以進一步考查。

第二組問題關係到企業民主對社會民主的正面影響。如果企業民主確實對社會民主具有溢出效應，或者反之亦然，那麼為甚麼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中會存在專橫暴虐的經理？^①另一方面，為甚麼在計劃經濟中，工人會享有更多的自主權？^②因此，企業民主可以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存活，而權威主義的管理也可以在民主的環境中生存。企業民主與社會民主之間的關係必須予以重新考查。

第三，現代化也許不一定是民主與政治參與的先決條件？如果

① 參見：Stephens, Evelyne Huber. 1980. *The Politics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 The Peruvian Approach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Academic Press):257.

工業化是民主的先決條件，為甚麼某些高度工業化國家，諸如戰前的德國與日本，會轉變成極權主義政體？進而，雖然所有當代的工業化國家都是民主的，但為甚麼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完成了工業化呢？^②因此，必須對現代化的環境予以界定，對民主參與的條件予以進一步闡明。最後，企業參與的「心理」益處真的對工作滿足感、工作付出和生產率有如此高的影響嗎？某些研究已經表明，工人自治和企業參與對減輕疏離感的效果比通常所估計的要少 (Greenberg 1986)，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參與並不增加工人對進一步參與的要求，也沒有證據使人相信工人願意用他們的收入來換取參與帶來的「心理」滿足 (Witte 1980, 148 and 150)。因此，企業參與和勞動效率之間的關係也必須予以進一步研究。

中國案例

不像布爾什維克革命發生在城市中心，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在農村地區獲得了廣泛的群眾支持。中國革命的這一特性與動員群眾和直接的群眾參與有直接關係。中國共產黨運用直接的群眾動員和參與的策略摧毀了社會特權階級，諸如地主、紳士、官僚與經理的權力。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的歲月裡，直接群眾參與繼續被作為組織農業生產的方法 (Burns 1988)。而且，群眾參與和工人自我管理被引入企業管理 (見下章) (Andors 1977)。因此，中國案例可以用來考查企業參與的有效性、企業民主的特性、動員式的參與和自發性參與之間的關係和社會參與和企業參與之間的關係。

第二，企業參與和工人自我管理不僅要達到政治目標，而且還

② 參見：Burawoy, Michael & Lucas, 1985, "Mythologies of Work: A Comparison of Firms in State Socialism and Advanced Capit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December) 723-737.

③ 例如印度。

誰來做主

要通過它們改善勞動生產率。這一點反映在流行的口號「抓革命，促生產」之中。革命包括消滅資方與工人之間的階級差別，提高工人參與管理的程度。通過在車間中建立與實施工人階級專政，勞動的積極性和生產力會得到改善，並且國家經濟會獲得迅速發展。因此，在政治與經濟之間，特別是企業參與勞動生產力之間存在着一種「辯證關係」。因此，中國可以作為一個案例來考察企業參與與對改善勞動生產力的作用。

第三，從1970年代早期開始，中國經歷了迅速的鄉鎮工業化過程。到1987年末，鄉鎮企業的總產值達到4763.9億元，是1987年農業總產值的52.4%。這是第一次鄉鎮企業的總產值超過農產品總產值(Rural Enterprise Bureau 1988, 2)。到1994年，鄉鎮企業（包括鄉、村、聯營和鄉村個體）的工業總產值是33683億元，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3%（《1995中國統計年鑒》，375）。從1975年到1985年，農村企業的工業總產出以年平均增長率32.6%的速度增長（發展研究所1987, 6）。1994年一億兩千多萬工人在鄉鎮企業中工作，大約是1978年鄉村工業僱員的4.3倍（《1995中國統計年鑒》，364）。鄉鎮工業化不僅有經濟意義，它也帶來迅速的社會變遷。隨着收入、住房、教育和福利的迅速改善，隨着工作需要更多的專門知識和技能，農村企業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發生了迅速的變化。這些變化，再加上共產黨領導下農村政治參與的強大傳統，是否會在工人中帶來參與管理決策的更多要求。因此，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經驗可以用來檢驗現代化理論。

總之，中國是一個一黨執政的國家，但正在經歷權力的分散；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又經歷着高水平的經濟增長；中國是一個傳統社會，但又在經歷着迅速的社會變遷。這些特徵使中國成為社會科學的絕好實驗室。

資料來源

本書的資料來源於幾個不同渠道。一部分是來自「1986-1987年世界銀行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對鄉鎮企業僱員的聯合調查」。(這一課題中包括五個子調查：企業僱員調查、企業領導調查、企業調查、企業定量調查和鄉領導調查)。這一調查是對中國地方工業的最大型的最為綜合性的資料搜集。樣本包括中國的四個縣中的 120 家工廠，這四個縣是：江蘇省無錫縣、廣東省南海縣、安徽省界首縣、江西省上饒縣。它們代表了政治控制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參見附錄表 A1 和 A2）。

在進行企業抽樣時，考慮了以下幾個重要因素：所有制形式、報酬類型、企業規模、企業中黨的組織，以及企業各項事務的決策過程。企業僱員的調查數據包括 1174 個答卷人和 112 個變量，變量中包括每個僱員的實際情況與態度方面的信息，諸如教育、年齡、性別、僱傭年限、對工作的滿意程度、工作安全感等等。調查是對從企業工資表中隨機抽取出來的工人進行的。工人被告知他們的回答將予以保密。問卷調查的具體方法也保證了對答卷人保密的可能性 (Byrd 1991, Ch. 2)。

一個問題是著名的「溫州模式」並未包括在樣本內。這種模式基於大量的私營企業、蓬勃發展的私營金融市場和與中國偏遠地區的廣泛商業聯繫。這一問題可以由樣本中包括界首縣這一事實予以解決。界首具有可以追溯到 1930 和 1940 年代抗日戰爭時期的商業傳統。它還擁有中國四大主要牲畜市場之一。在界首，鄉鎮企業部門的發展模式類似溫州模式。在這裡，資源裡匱乏，而市場活動給當地居民帶來了財富。界首縣政府大力鼓勵個體企業的發展，幫助它們獲得貸款和原材料，對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和工人薪金上 unlimited。少於半數的企業領導者是由地方政府委派的。鄉鎮企業對於市